

## 从《姐妹》与《圣恩》看乔伊斯的文化焦虑

李兰生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在乔伊斯看来,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那些生活在殖民文化语境下的爱尔兰芸芸众生无论如何都无法摆脱生存的困境, 他们都患上了一种精神“瘫痪”的痼疾。因此, 用文学的形式来揭露这种痼疾, 把国人从麻木不仁中唤醒, 便成为了他的艺术使命和道德担当。其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的《姐妹》和《圣恩》揭示的就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心理的瘫痪。乔伊斯对这种瘫痪的现状有着深深的焦虑, 而这种焦虑, 又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根由, 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焦虑。

**关键词:** 乔伊斯; 《姐妹》; 《圣恩》; 精神瘫痪; 文化焦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1)04-0136-07

《都柏林人》(*Dubliners*)是爱尔兰现代主义小说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创作的第一部叙事作品, 这部被批评界誉为用英语所写的最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共有 15 个故事, 大约完成于 1904—1907 年间。乔伊斯原来打算只写 12 篇, 后来在结集成书出版时又增加了 3 篇(《两个骑士》《一片小云》《亡人》)。①最早的 3 篇(《姐妹》《伊芙琳》《车赛之后》)是应当时的文化名流拉塞尔(George Russell)之约, 用斯蒂芬·代达勒斯(Stephen Dedalus)的笔名, 分别于 1904 年 8 月 13 日、9 月 10 日和 12 月 17 日发表在拉塞尔主编的《爱尔兰家园》(*The Irish Homestead*)周报上。这家周报的主要读者群体是爱尔兰农民, ②不料, 这些小说在发表之后不断有读者写信给报社, 表达他们的“震惊”与“不满”, 该报不再愿意发表乔伊斯的其他小说<sup>[1](161)</sup>。这样一来, 《都柏林人》从创作、刊发到结集成书出版, 经历了近十年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从读者的“震惊”和“不满”到《爱尔兰家园》报社的不再发稿和出版商的一再拖延, 表明《都柏林人》这部作品具有“不入流”的文学性质。它之所以“不入流”, 在于乔伊斯没有刻意“迎合大众的喜好”, 在于其力图“摆脱周围粗俗的影响”, 没有宣扬“迷迷糊糊的狂

热激情”, 没有“乖巧的曲意奉承”, 没有因为“虚荣和庸俗的追求而一味地讨好卖乖”。<sup>[2](71-72)</sup>他的这种文学取向在 20 世纪初的爱尔兰显得有些“不识时务”。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下, 爱尔兰的民族意识高涨, 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 在政治上以去殖民化寻求民族独立、在文化上以去英国化来构建民族文化身份的呼声不绝于耳。政治家阿瑟·格里菲思(Arthur Griffith)致力于组建旨在推动民族独立的新芬党(在盖尔语中, “Sinn Fein”的意思是“我们自己”)。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成立了旨在复兴爱尔兰母语的盖尔语协会(the Gaelic League)。③莫伦(D. P. Moran)创办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报刊《领袖》(*The Leader*), 宣扬建立以“天主教意识和不同天主教传统”为主体的“爱尔兰人的爱尔兰”<sup>[3](166)</sup>。叶芝、格雷戈里夫人、拉塞尔等文学名流, 缅怀凯尔特昔日的辉煌, 挖掘爱尔兰的神话、传说和民俗中丰富的素材, 弘扬民族文化、讴歌民族精神, 希望激活被历史尘封的文化传统来实现爱尔兰的文艺复兴。叶芝甚至宣称: “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伟大的文学, 没有文学也就没有伟大的民族”<sup>[4](142)</sup>。乔伊斯对民族主义虽然有些同情, 甚至认为新芬党的“政策会使爱尔兰十分受益”<sup>[5](102)</sup>。他敬重叶芝的文学才华, 曾在 1899 年 5 月拒绝参与同学们抗议叶芝剧目《凯瑟琳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Cathleen*)的活动。但是, 他对盖尔语复兴和文艺复兴运动没有太大的兴趣。在他看来, “像古埃及一样, 古爱尔兰也已经死

收稿日期: 2011-04-12; 修回日期: 2011-06-20

作者简介: 李兰生(1962-), 男, 湖南新化人,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比较文学。

去，它的哀歌已经唱完，它的墓碑也已经封牢”<sup>[2](173)</sup>。他进而转述王尔德对叶芝所说的话：“我们爱尔兰人什么事都没做成，但是我们是自古希腊人的时代以来最伟大的空谈家”<sup>[2](174)</sup>。显然，乔伊斯对那些怀思古之幽情的文艺创作倾向感到不满，对那些不敢正视爱尔兰社会现实和民族文化劣根性的文学作品深感焦虑，他不想把《都柏林人》写成一部美化爱尔兰历史文化传统的“空谈”之作，他坚信“一个作家的目的就是要描写他那个时代的生活”<sup>[6](32)</sup>。

## 二

《都柏林人》是一部直面爱尔兰的社会现实、痛陈爱尔兰民族文化劣根性的现实主义杰作。但是，在表现方式和艺术技巧上，它又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完美结合。这部作品取材于乔伊斯早年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其时代背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间上限为1895年，下限为1905年)，场景为爱尔兰首都都柏林这座“存在了几千年的欧洲之都”“面积差不多是威尼斯的三倍”和“大不列颠帝国的第二大城市”<sup>[7](122)</sup>，叙事对象主要是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中下层爱尔兰人。15个故事虽然都单独成篇，每篇都有自己独立的情节和主题结构，每篇都“讲述一个类似的故事”，“记载一次未遂的努力”，“叙述一次受阻的欲望”<sup>[8](330)</sup>，设置一个或多个“显现”(epiphany)<sup>④</sup>。但是，这些故事按照一个人的成长年表与社会活动(从童年、青年、成年到社会生活)，并“以相互关联的主题与意象动机为基础”<sup>[1](157)</sup>，组成一个类似于长篇小说结构的艺术有机整体。场景、事件和人物的背后有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寓意，各式各样的人物都不是“英雄”，他/她们既是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不同“个体”，也是“一种民族类型”<sup>[1](201)</sup>。这些人物的生活、言行、情感、思想、信仰、意识、无意识，统统被乔伊斯纳入了他的叙事视野，成为体现爱尔兰民族“集体性格”的表征。正是这种从个别到一般、从一座城市到整个国家、从都柏林人到整个民族相统一的“社会象征行为”所呈现的人物生活剪影<sup>⑤</sup>，折射出了乔伊斯对爱尔兰民族文化心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情怀。

1906年5月5日，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兹的一封信中，乔伊斯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的这种焦虑情怀。他说：“我的意图是要写作一章关于我国的道德史，我之所以选择都柏林作为场景，是因为这座城市在我看来就是瘫痪的中心。我已从童年、青年、壮年和社会生活这四个方面，设法把这座城市呈现给那些冷漠的公

众。故事的编排即按照这一顺序，其中的大部分故事我是用一种审慎的平庸文体写成的。”<sup>[7](134)</sup>其实，《都柏林人》既是一部“道德史”，也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sup>[9](76)</sup>但是它并不是道德说教，也不是对都柏林人的善与恶、是与非、对与错进行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而是要通过真实“呈现”一个城市里的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一系列人物的人生经历，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来对爱尔兰民族的文化心理瘫痪进行一种全面的清理和探索。乔伊斯就是要用文学来对国人进行一次独特的文化启蒙，让他们认识到爱尔兰人为什么总是那么冷漠、狭隘、麻木不仁，为什么总是那么畏畏缩缩、萎靡不振、唯利是图、自暴自弃；为什么总是时时受挫、处处碰壁，无论如何也无法走出困境。他要冷峻地剖析和诊断“都柏林和爱尔兰社会出了什么毛病”<sup>[1](205)</sup>，都柏林为什么沦为了“瘫痪的中心”，爱尔兰人的精神状况如何，这种精神状况与爱尔兰的文化有什么本质的联系。他要拿起文学这面“镜子”映照爱尔兰人瘫痪的民族文化心理，希望他们明白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的全面瘫痪才是阻碍爱尔兰文明进程的首要原因。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民族文化心理是指“生活在某一文化环境中人们共同的心理状态”，这种“共同的心理状态”是“人与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sup>[10](49)</sup>是一定时代的文化构成要素在同一文化语境中的芸芸众生的心理所打下的各种文化烙印。民族文化心理就是一种文化集体无意识。“爱尔兰是西欧唯一经历了早期和晚期殖民的国家……一种被彻底剥夺的历程。一个被殖民的民族没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甚至也没有一种独特的语言。”<sup>[11](3, 11)</sup>同时，爱尔兰又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民族，历史上至少存在着四种文化类型：天主教文化、新教文化、凯尔特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sup>[12](17-26)</sup>。然而长期以来，“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已经形成了一种阻碍产生一个趋同社会的力量”。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往往导致“法律和秩序的崩溃”，非但“不能促成统一，反而成为了无政府状态的根源”，最终“难以使爱尔兰人对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形成某种一致的看法”<sup>[12](2)</sup>。另外，人们的社会意识往往是由某种社会现实所决定的，爱尔兰这种无序的文化生态无疑会以各种形式、在各种程度上影响或支配爱尔兰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感、行为与活动，在他们的主观世界形成一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集体文化心理。乔伊斯悉谙自己国家的这种文化状况，在他看来，爱尔兰民众始终无法以包容的心态，来理性地接受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客观现

实。相反，他们对异质文化采取一味排斥的态度：天主教徒视新教为异端，新教徒认为天主教徒不仅“贫穷”而且“愚昧无知”，具有凯尔特血统的爱尔兰贵族们一方面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嫉恶如仇，另一方面又“沉迷于幼稚的国内争端，用战争来消耗这个国家的元气”<sup>[2](167)</sup>。现代爱尔兰人都患上了一种“精神瘫痪”的文化痼疾，这是一种可怕的民族精神疾患，必须彻底根治。而他们所生活的都柏林这座“可爱的脏兮兮的城市”<sup>[13](233)</sup>则沦为了“瘫痪的中心”<sup>[7](134)</sup>。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里，“瘫痪”是对“整个爱尔兰民族精神状况的一种隐喻”<sup>[14](xxxvi)</sup>。它不仅是个人的和社会的瘫痪，也不只是“道德和精神的瘫痪”或“都柏林城市文化和中产阶级文化的瘫痪”<sup>[15](65)</sup>，而是指一个民族“偏瘫的或瘫痪的灵魂”<sup>[16](55)</sup>，亦即“瘫痪”的民族心理。乔伊斯就是要通过刻画一群普普通通的都柏林人，用“审慎的平庸文体”<sup>⑦</sup>来揭示爱尔兰民族文化心理“瘫痪”的种种表现形态，把国人从精神麻木中唤醒，为推动“爱尔兰的文明进程”和民族的“精神解放”跨出关键的一步<sup>[2](88)</sup>。

### 三

《姐妹》<sup>⑧</sup>是《都柏林人》的第一个故事，在整部作品中具有“序言”的性质。在这个故事的开篇，乔伊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兼主人公——一位既没有姓名也没有父母的小男孩的朦胧意识和平淡无奇的叙事话语，首先把他对爱尔兰民族文化心理瘫痪的焦虑揭示出来：

每晚当我仰视那扇窗户的时候，我对自己轻声念叨着“瘫痪”这个字眼。它像欧几里德的“磐折形”和教理问答中的“买卖圣职”这些词语，总是怪怪地在我耳际作响。而现在，它念起来就像是某个恶人或罪人的名字，使我害怕。可我就是想离它更近点，想看看它那致命的功效。<sup>[13](165-166)</sup>

不断困扰着这位男孩的“瘫痪”虽然神秘、可恶、可怕而又具有某种“致命”的后果，但是，他还是要勇敢地面对、看看其恶果究竟有多大。在这里，叙事者虽然不完全是作者的传声筒，但是，他的意识无疑融合了乔伊斯自己的意识，他对“瘫痪”的焦虑也是乔伊斯的焦虑。与这位男孩一样，乔伊斯也渴望深入到都柏林这个“瘫痪的中心”，对“瘫痪”这一民族文化心理的病态现象进行认真的审视。<sup>⑨</sup>

进入男孩意识中心的是一位因中风而丧命的天主

教神父：“这次他没救了：这是第三次中风”<sup>[13](165)</sup>。这位名叫詹姆斯·弗林的神父生前和男孩是好朋友，男孩常常带一些鼻烟去看望神父，神父教授男孩拉丁语和一些教理知识。虽然故事对神父与男孩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说明清楚，但是，乔伊斯学者托奇安纳认为，神父似乎一直是这位男孩的“精神导师”，因此，神父的“瘫痪”和去世预示着这位敏感、颇有文学想象力的男孩未来的命运<sup>[17](26)</sup>。神父死后，男孩和婶婶去神父家悼唁，他隐隐约约听到死者的妹妹伊莱扎讲述神父患病的起因和经过：“就是因为他打破了那只圣杯……那就是事情的起因……他的精神受了刺激……于是，他们认为他出了问题……。”<sup>[13](174)</sup>乔伊斯通过这一段寓意有些含混的话语巧妙地道出了神父患病的原由。原来，神父患的是一种称作“麻痹性痴呆”(general paralysis of the insane)的疾病，这种病是因神经性梅毒感染所致，精神失常是该病的一种征兆<sup>[17](20)</sup>。乔伊斯把神父的精神失常与打破一只圣杯联系起来，旨在构建一种象征意义。根据基督教教义，圣杯代表耶稣的身体，对于神职人员而言，打破圣杯意味着“亵渎圣物”和摒弃精神信仰，这当然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乔伊斯学者普遍认为，弗林神父这个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蕴，这位神父既象征“上帝”“教皇”“玫瑰十字神父”，又象征“耶稣”和“爱尔兰天主教会”。爱尔兰是一个天主教国家，罗马天主教是爱尔兰的国教。据统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在都柏林就有83%的市民是天主教徒<sup>[14](xxx)</sup>。乔伊斯甚至认为，在全爱尔兰的人口中，天主教徒所占的比例高达90%<sup>[2](169)</sup>。因此，对爱尔兰民族而言，摒弃精神信仰意味着整个民族精神的瘫痪。乔伊斯把弗林神父的死期定在1895年7月1日，正好巧妙地传达了这层象征意蕴。首先，这一天恰好是爱尔兰的国殇日。1690年7月1日，在爱尔兰北部的博因河战役中，被罢黜王位的詹姆斯二世率领的天主教联军(其大部为爱尔兰天主教徒)被其女婿荷兰王子奥伦治的威廉(1689年初与其夫人玛丽，即詹姆斯二世的长女一道成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君主)率领的新教军队击败，这场战役标志着爱尔兰彻底沦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从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英国殖民者和爱尔兰的新教权贵对爱尔兰的统治和压迫日益加剧，广大的爱尔兰天主教民众因为土地不断被掠夺而成为流离失所的“佃户和劳工”<sup>[18](164)</sup>。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严厉压制，天主教徒的宗教活动被取缔，爱尔兰成了一个在政治上被外族奴役和失去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民族。颇有意思的是：这位神父的名字正好与詹姆斯二世的名字部分

相同。一个曾经是都柏林市“米思街圣凯瑟琳大教堂”<sup>[13](168)</sup>的天主教神父，另一个是信奉天主教、曾经对爱尔兰的臣民实施“仁政”的英国国王，他们两个人的悲惨结局合成为爱尔兰民族境遇的象征。其次，7月1日又是基督宝血节，这是罗马天主教纪念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法定节日。乔伊斯通过基督宝血节把弗林神父之死与耶稣的流血牺牲联系在一起，目的在于设置一种“反讽”<sup>[17](21)</sup>，在两个艺术形象之间构建一种主题对话关系。弗林神父的信仰缺失、精神失常、瘫痪和因病而亡与耶稣的笃信、坚毅、博爱、勇敢和视死如归正好成为鲜明的对照，耶稣的崇高使弗林神父的微不足道相形见绌。弗林神父成了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瘫痪的耶稣”<sup>[17](19)</sup>，他的遗体躺在棺木里，“胸前放着一只无用的圣杯”<sup>[13](174)</sup>。如果说弗林神父是爱尔兰民族的代表，那么，那只“无用的圣杯”就是这个不幸的民族信仰沦丧的象征。

对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民族而言，宗教信仰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力量，而信仰沦丧是一种可怕的精神危机，这种精神危机在《都柏林人》中也表现为物欲的泛滥，物欲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贪食、贪财、贪色。在这部作品的第十四个故事《圣恩》中，乔伊斯通过一个商人的贪杯和一个神父媚俗的布道把爱尔兰人这种“三贪”的丑态揭示出来。这个故事的叙事分为三个部分：①一位因经营不善而负债累累的茶商克南先生虽然落寞但常常贪杯，在都柏林市中心一家酒吧，他喝得酩酊大醉时不慎从酒吧楼梯上摔下，躺在洗手间的地板上不省人事，被人救起时发现自己的坠落时居然还咬掉了一块舌头。他的一位好友鲍尔先生路过时见此情形，将他送回家里休养。②在市西北郊克南家的卧室，前来探望克南的鲍尔先生和几位友人一边饮酒，一边商量结伴去都柏林一座耶稣会教堂参加专门为商人和职业人士安排的一次静修。克南先生原来是新教徒，结婚时不得不皈依了天主教。但是，婚后“他已有二十年没去过教堂了”，而且还“喜欢对天主教说些风言风语”<sup>[13](318)</sup>。尽管并不情愿去参加这次“净化灵魂”的活动<sup>[13](324)</sup>，但在朋友们的劝说下他最后还是同意去。③在市中心加德纳上街的耶稣会教堂，克南先生一行五人以“梅花五点”的排列分坐在长凳上<sup>[13](333)</sup>，倾听珀登神父的布道。乔伊斯学者(最早是乔伊斯的胞弟斯坦尼斯洛斯)普遍认为《圣恩》是对但丁的《神曲》的戏仿，故事中的三个地点分别对应于地狱、炼狱和天堂<sup>[17](205)</sup>。

《圣恩》最出彩的地方是对天堂的戏仿。在这里，

珀登神父首先以《路加福音》中耶稣讲述的那个关于“不义的管家”的寓言开始布道：“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因此，要从罪恶之财神中结交朋友，到了你们死去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sup>[13](334)</sup>这段被改动了几个词汇的引文源自“兰斯《新约》版”<sup>[17](219)</sup>，珀登神父将其视为耶稣专门“对生意人和职业人士所讲的一段经文”<sup>[13](334)</sup>。他肆意发挥、大谈特谈耶稣如何特别关照所有的凡夫俗子，如何“给他们忠告，在他们面前把那些崇拜财神之人推举为宗教生活中的楷模，尽管在芸芸众生中，这些人对宗教事务最不关心”。他宣称“作为一个与自己的朋友谈心的俗人”，“他是来和生意人谈话的”，所以，“他愿意用谈生意的方式对他们说话”，说自己就是“他们的精神会计师”，并希望这些生意人能“藉着天主的圣恩”“改正这样那样的错误”，“修正自己的帐目”<sup>[13](335)</sup>。珀登神父的布道是《圣恩》最精彩的“显现”，这位耶稣会神父的高谈阔论把耶稣的这则道德寓言曲解得几乎体无完肤。他似乎忘记了耶稣在这则寓言的结尾清清楚楚地告诫他的门徒不要贪恋不义之财：“你们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sup>[19](16:13)</sup>。珀登神父显然把耶稣的这一忠告扔到了九霄云外，他完全将这则寓言的道德寓意颠倒了过来。他不仅肯定不义商人敛财的合理性，而且还鼓励他们时刻审查账簿，确保收支平衡。根据天主教教义，神父理应是上帝的代言人，应该超然于物欲之外、视金钱如粪土，然而珀登神父布道时却是满口的生意经，全然一副拜金主义的嘴脸。他的精神信仰发生了本质的变异。乔伊斯还恶作剧似地将这位神父的教名与都柏林臭名昭著的红灯区珀登街(Purdon Street)联系在一起，让神父在圣体灯的“一点红光”前“双手捧着脸作祷告”<sup>[13](334)</sup>，语不惊人地把这座神圣的殿堂描述成一座灯红酒绿的青楼，把珀登神父影射为这家青楼的楼主。

乔伊斯笔下的这位耶稣会高级牧师不仅成了物欲的代言人，而且还是淫欲的化身。那些慕名前来“净化灵魂”的教众，如落魄商人克南，他的朋友坎宁安、鲍尔、麦科伊和福加蒂，放高利贷者哈福德，典当商迈克尔·格列姆斯，市长选举的幕后策划者范宁，破产的商业巨头奥卡罗，《自由人报》大记者亨德里克，丹·霍根的侄子，他们在这座污秽之所里聆听了珀登神父的这番亵渎基督教精神的“教诲”不知有何感想。他们向往的“天堂”居然是这般模样，引领他们进入“天堂”的精神之父原来也不过是一个贪财贪色之辈，他们从他那儿领受的“圣恩”是那样俗不可耐。颇有意思的是：“圣恩”的英语原文“grace”还有“优美、雅致”之意，另

外,“Grace”还是一个人名。但是,这个人名在盖尔语中是“丑陋”的意思,另外,英语词“grease”(油脂、贿赂)在爱尔兰英语中也被读成了“grace”<sup>[17](207)</sup>。乔伊斯是一个以细腻著称的作家,而且在大学学的是语言学,他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词的一语多义现象。他把“grace”一词中蕴含的神圣与世俗、“优雅”与“丑陋”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意义巧妙地融入这个故事的标题,目的是要凸现失去了精神信仰的爱尔兰宗教生活是如此虚伪和丑陋,从而使这个故事的反讽效果得到强化。

在《姐妹》开篇的那段话语中,除“瘫痪”之外,困扰男孩的还有另外两个词语:“磐折形”与“买卖圣职”。“磐折形”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指的是一个平行四边形在上、下、左、右任何一方截掉一个小平行四边形之后所余下的那个部分,无论怎么截,除了面积的缩小之外,“磐折形”的平行四边形性质都不会发生改变。乔伊斯学者认为:乔伊斯使用“磐折形”这个几何图形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方面,虽然《都柏林人》刻意省略了许多细节,留下了一些情节的“空隙”和人物话语的“空白”,但是作品的主题意蕴还是能够通过“在场”与“缺席”之间固有的张力显现出来,乔伊斯是在暗示读者在解读这部作品时不要忽视那些省略的情节和人物话语<sup>[20](250)</sup>。另一方面,“磐折形”是一个与“瘫痪”密切相关的艺术形象,它象征着“缺失”“残缺”“不完整”“不健全”<sup>[1](207)</sup>。《姐妹》《偶遇》和《阿拉比》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兼主人公,即那三位既没有父母也没有姓名的男孩,正好可以看成是爱尔兰民族的象征。他们没有父母意味着这个民族文化传统的缺失,他们的无名无姓暗示着这个民族是一个丧失了民族身份的“文化孤儿”。正是因为这些有利于推动一个民族文明进程和保持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文化元素的“不在场”,爱尔兰才沦落为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瘫痪的国度。另外,《一位母亲》中瘸腿的霍罗汉,《土》中那位鼻子和下巴长得像巫婆的小个子老处女玛丽亚,《圣恩》中那位酒醉后不慎从楼梯上坠落、咬掉一块舌头的茶商克南先生,《伊芙琳》中因癫狂而死的伊芙琳的妈妈,《偶遇》中的那位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古怪老头”<sup>[13](182)</sup>,《两个骑士》中迷失了自我、对“各式各样的蛮横无礼全然不在意”的“寄生虫”莱纳汉<sup>[13](208)</sup>,《一片小云》中自卑、腼腆、成为“人生囚徒”的小个子钱德勒<sup>[13](241)</sup>,《一桩伤心事》中孤独自闭和“被逐出了人生之盛宴”的达非先生<sup>[13](276)</sup>,这些人物不是身体残缺就是人格不健全,有些人已经死去,活着的人也只不过是些精神瘫痪的行尸走肉,在本质上与死去的弗

林神父没有区别。

也许是因为受到神父之死的刺激,那位“特别敏感的”男孩在去掉唁神父的前一天晚上作了一个噩梦。在梦中,他看到的神父不仅是一个“瘫痪之人”<sup>[13](167)</sup>,而且还是一个“买卖圣职者”,他那张“灰色的脸”正在“轻言细语地”对男孩进行“忏悔”<sup>[13](168)</sup>。根据罗马天主教会的律法,“买卖圣职”是一种重罪,神职人员中犯此罪者应被开除出教廷。神父之所以向男孩忏悔,是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抛弃了神圣的信仰,成了一个背叛天主的罪人。这可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托奇安纳认为:“买卖圣职”一词与“磐折形”和《姐妹》中出现的另外一词“玫瑰十字会员”都有关联,乔伊斯的用意是要把弗林神父刻画成一位“旨在净化天主教会”的东方圣人西蒙,一位“玫瑰十字会”的创始人;而男孩的叔叔也恰好戏称这位侄儿为“玫瑰十字会员”<sup>[13](167)</sup>,在这位叔叔看来,神父作为男孩的“忘年之交”对这位少年“寄予厚望”<sup>[13](166)</sup>,于是,他便充当了这位没有父亲的男孩的精神之父,引领男孩进入文学殿堂,以便“有朝一日在一个新的罗马神权面前同彼得和保罗决一雌雄”<sup>[17](27)</sup>。

托奇安纳过分强调文外语境做出的这种解读有些阐释过度。从《姐妹》的文内语境不难看出,男孩对神父的过世既不感到悲痛也不感到惊奇,他明白,一个丧失了精神信仰的神父必然会面对最后的审判。正是因为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神父之死“似乎”反而让男孩“产生了一种释然的感觉”<sup>[13](169)</sup>。神父的罪孽太重而不可赦免,他的灵魂无法进入天堂。乔伊斯在这个带有“序言”性质的故事中借用“买卖圣职”一词,主要是用来指代精神堕落。在他的眼里,宗教、政治、社会的腐败、没有信仰、丧失良知、惟利是图、坑蒙拐骗等等都是精神堕落的表现,这些现象如同“垃圾坑、旧丧服和下水的臭气”,渗透在《都柏林人》的每一个故事中<sup>[5](89-90)</sup>。《车赛之后》中与英国、法国、美国朋友在都柏林南郊国王镇港(现名丹莱里港)游艇上通宵达旦豪赌的爱尔兰花花公子吉米,《两个骑士》中骗钱骗色的科利少爷,《公寓》中设立陷阱拉郎配的老板娘穆尼夫人,《如出一辙》中贪杯和对儿子施暴的法林顿,《土》中反目成仇的亲兄弟约和阿尔斐,《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中那些虚伪的政客和庸俗、惟利是图的拉选票者,《一位母亲》中背信弃义的艺术经纪人、娇揉造作的音乐人、狭隘和咄咄逼人的卡尼太太,《圣恩》中伪善的政客、商人和俗不可耐的珀登神父,这些人物丑陋的行径只不过是爱尔兰民族文化心理瘫痪

的不同表现形式，在本质上与“买卖圣职”没有区别。

#### 四

乔伊斯在《都柏林人》的开篇引出的“瘫痪”“磐折形”“买卖圣职”三个意象，与这个故事中的叙述事件——神父之死一道，构成了一条“瘫痪→缺失→堕落→死亡”的主题发展链，与《都柏林人》其他故事的主题形成了巧妙的照应。这一主题发展链条中的最后一项——“死亡”在尾篇《亡人》中达到高潮，象征性地昭示着民族文化心理的瘫痪给爱尔兰民族产生的危害。有批评家指出：乔伊斯把这部短篇小说集的其他故事镶嵌在第一个故事《姐妹》和第十五个故事《亡人》之间，假如我们把这两个故事的标题互换，其主题意蕴也不会有“明显的损害”<sup>[14](xxxviii)</sup>。《姐妹》中的两姐妹恰好与《亡人》中的莫肯两姐妹形成了对位，她们都是年迈而没有出嫁的老处女，《亡人》中的那些死者(主要是迈克尔·福雷)也正好与《姐妹》中的弗林神父遥相呼应；《都柏林人》的第一句叙事话语“这次他没救了：这是第三次中风”，与最后一句叙事话语“那场穿过寰宇软塌塌飘落的雪，像死者和生者最后的结局，软塌塌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构成了一种出神入化的主题契合。那场飘飞在爱尔兰“中部平原的每个角落和光秃秃的山丘上”，飘飞在“阿伦沼泽和遥远的西部”，飘飞在“黑色香农河汹涌波涛”<sup>[13](384)</sup>上的皑皑白雪，不就象征着爱尔兰的民族文化心理瘫痪给爱尔兰这个民族带来的悲惨结局吗？也许，只有当春天来临、冰雪消融之时，爱尔兰人民才能从瘫痪的民族文化心理中觉醒，重新获得勃勃生机。

#### 注释：

- ① 乔伊斯按照童年、青年、壮年和社会生活的题材把这部作品的故事分为四组。童年三篇：《姐妹》(“The Sisters”)、《偶遇》(“An Encounter”)、《阿拉比》(“Araby”)；青年四篇：《伊芙琳》(“Eveline”)、《车赛之后》(“After the Race”)、《两个骑士》(“Two Gallants”)、《公寓》(“The Boarding House”)；壮年四篇：《一片小云》(“A Little Cloud”)、《如出一辙》(“Counterparts”)、《土》(“Clay”)、《一桩伤心事》(“A Painful Case”)；社会生活四篇：《委员会办公室里的常春藤日》(“Ivy Day in the Committee Room”)、《一位母亲》(“A Mother”)、《圣恩》(“Grace”)、《亡人》(“The Dead”)。
- ② 乔伊斯曾把该周报戏称为“猪猡之报”。
- ③ 盖尔语系凯尔特语的一支，为爱尔兰人的母语。
- ④ 1月6日是天主教的“主显节”(the Feast of the Epiphany)，即基督显灵日。乔伊斯借用“epiphany”一词来指代“某一事物隐在

本质的显现”，在《英雄斯蒂芬》中，他以叙述者的口吻对“显现”进行了定义：“关于显现，[斯蒂芬]指的是一种顿然的精神显现。不论在粗俗的言行中，还是在某一令人难忘的心绪中，这种显现都会发生。他认为作家就是要特别仔细地记录这些显现，因为这些显现本身最微妙而且转瞬即逝。”参见 A. Nicholas Fargnoli and Michael P. Gillespie, *James Joyce A to Z: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to the Life and Work*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95) 66。

- ⑤ 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任何一种文学文本都是“社会和政治的文化文本”，透过这种文本，可以见出一个民族、国家、社会的“集体性格”即“对立的各个阶级”的“意识形态素”。参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11、75页。
- ⑥ 本文引自《都柏林人》的原文为笔者所译，依据的版本为 James Joyce, *Dubliner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3)。
- ⑦ 乔伊斯学者戈特弗赖在《再议“审慎的平庸”：〈都柏林人〉的文体戏仿》一文中认为：《都柏林人》的“平庸文体”是一种“既不好也不坏”和“缺乏风格的文体”，这种文体既是“对公众所期待的爱尔兰文艺复兴作家写作风格的嘲讽”，也是对“都柏林瘫痪面貌的戏仿”。这种对“瘫痪”的文体戏仿正好促成了这部作品在形式、内容与主题上的有机统一。参见 Vincent J. Cheng and Timothy Martin, eds., *Joyce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 156, 163, 153。
- ⑧ 1914年结集成书出版的《姐妹》已经作了重大的修改，不仅篇幅增加了一半，而且段落和文字都作了许多改动。本文的讨论所依据的是乔伊斯的修改稿。
- ⑨ 乔伊斯也许一生都无法忘却“瘫痪”，1930年，他在巴黎和一位友人还在谈到这个词：“在《都柏林人》的第一个故事中，我曾写道‘瘫痪’这个词使我害怕和恐惧，好像它是指某种邪恶和有罪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个词，而且常常在黄昏时对着敞开的窗户轻声念叨着它。”参见 Willard Potts, ed., *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 Recollections of James Joyce by Europeans* (Seattle: U of Washington P, 1979) 132。

#### 参考文献：

- [1] Walz F L. *Dubliners* [C]// Zack Bowen, James F. Carens. *A Companion to Joyce Studie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4: 157-228.
- [2] Mason, Ellsworth, Richard Ellmann, et al.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C].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9.
- [3] Levenson, Michael. Living History in ‘The Dead’ [C]// Daniel R. Schwarz. *The Dead: Complete, Authoritative Text with Bi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Critical History, Essays from Five Contemporary Critical Perspectives*. Boston: Bedford/Martin’s, 1994: 163-77.
- [4] Deane, Seamus. *A Short History of Irish Literature* [M]. London: Hutchinson & Co. Ltd, 1986.
- [5] Ellmann, Richard, ed. *Selecte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C].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75.
- [6] Beja, Morris. *James Joyce: A Literary Life* [M].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92.

- [7] Ellmann, Richard. *Letters of James Joyce*. Vol.II [C].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66.
- [8] Kiberd, Declan. *Inventing Irel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Modern Nation* [M]. London: Vintage, 1996.
- [9] Ghiselin, Brewster. The Unities of Joyce's *Dubliners* [J]. *Accent* 1956(16): 75-78.
- [10] 时蓉华. 社会心理学词典[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 [11] Deane, Seamus. "Introduction"[C]//Terry Eagleton, Fredric Jameson, Edward Said. *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3-19.
- [12] Lyons, F. S. L. *Culture and Anarchy in Ireland: 1890-1939*[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 [13] Joyce, James. *Dubliners*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3.
- [14] Brown, Terence. Introduction [C]// James Joyce. *Dubliner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vii-vilix.
- [15] Schwarz, Daniel R. *James Joyce, "the Dead"*[C]//.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1994.
- [16] Gilbert, Stuart. *Letters of James Joyce* [C].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57.
- [17] Torchiana, Donald T. *Background for Joyce's Dubliners* [M]. Boston: Allen & Unwin, Inc., 1986.
- [18] Fry, Plantagenet Peter, Fiona Somerset Fry. *A History of Ireland* [M]. London: Routledge, 1988.
- [19] 圣经[M]. 南京: 中国基督教协会, 1995.
- [20] Senn, Fritz. "Gnomon Inverted"[C]// *ReJoycing: New Readings of Dubliners*. Rosa M. Bollettieri Bosinelli and Harold F. Mosher Jr.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8. 249-57.
- [21] Fagnoli, A. Nicholas, Michael P. Gillespie. *James Joyce A to Z: the Essential Reference to the Life and Work*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1995.
- [2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 王逢振, 陈永国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23] Cheng, Vincent J. Timothy Martin. *Joyce in Contex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4] Potts, Willard. *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Exile: Recollections of James Joyce by Europeans*[C].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9.

## Joyce's anxiety of culture over spiritual "Paralysis" in "The Sisters" and "Grace"

LI Lansheng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Joyce's view, from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common Irish living in the colonial cultural context are unable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ir existential dilemma whatever they attempt to do. They are all afflicted by an aeipathia of spiritual "paralysis," over which Joyce has an intense anxiety. Therefore, he feels it his artistic mission and moral duty to lay bare in the form of literature such a chronic disease so as to awaken his countrymen from their torpor. This essay, through a close textual analysis of "Sisters" and "Grace" in *Dubliners*,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what Joyce reveals in his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is actually the paralysis of the Irish national psychology; Joyce's anxiety over this spiritual paralysis has its soci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oots, therefore his anxiety is in essence an anxiety of culture.

**Key Words:** Joyce; "The Sisters"; "Grace"; spiritual paralysis; anxiety of culture

[编辑: 苏慧]